

培文书系·社会理论新视角

文化、技术与 社会中的身体

The Body in Cultur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英] 克里斯·希林著 李康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培文书系 社会理论新视角

文化、技术与 社会中的身体

The Body in Cultur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英] 克里斯·希林著 李康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8-317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英]克里斯·希林著;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

(培文书系·社会理论新视角)

ISBN 978-7-301-18170-6

I. ①文… II. ①希… ②李… III. ①身体—社会行为学—研究 IV. ①C912.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3078号

The Body in Cultur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by Chris Shilling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 2005 Chris Shilling.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 名: 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

著作责任者: [英]克里斯·希林 著 李康 译

责任编辑: 徐文宁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170-6/C·063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17.25印张 390千字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致 谢

Philip A. Mellor 和 Keith Tester 鼎力支持，深入评点，殊为可贵，Ian Burkitt、Mike Hardey、Caroline New 和 Pauline Leonard 等人的意见也使本研究大为增色。在赛智出版集团方面，Chris Rojek 的热情鼓励和中肯建议，完全符合你心目中的理想编辑，而 Ian Antcliff 与 Kay Bridger 在出版加工过程中的技术协助，也让我心生感佩。《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编辑团队依然为我的研究提供着宝贵支持，朴茨茅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也慨允我进行学术休假，使我得以完成书稿。这项写作计划持续数年，始终得到各方帮助。我特别要感谢 Xulong Lee^[1] 的长期协助与专业技能，也感谢 Richard Gulliver 的帮助。Max 和 Katie 为这段原本枯燥的时光平添了不少欢乐，但此时此刻，我想将本书献给 Debbie，我的爱妻、挚友和良助。

[1] 在同年出版的《身体与社会理论》(增订版)的致谢中，此人的拼法为“Xuelong Li”。——译注(以下凡原书注会标明“原注”及原书页码，未标明者皆为中译注，不再逐一说明)

目 录

致 谢	2
第一章 概 论	1
第二章 古典的身体	26
第三章 当代的身体	51
第四章 工作态身体	79
第五章 运动态身体	107
第六章 音乐态身体	136
第七章 社交态身体	160
第八章 技术态身体	188
第九章 结 论	215
参考文献	226
中外人名索引	253
中外主题索引	262

第一章 概 论

<1>

过去二十年来,关于身体的社会理论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曾几何时,身体只是一项可有可无的学术兴趣,时至今日,身体已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思想主题,乃至至于不管是什么学术研究,如果不至少花点笔墨谈谈行动的具身性(embodied)前提,不谈谈社会结构的身体效应,就不能宣称完备周详。在社会学里,有关具身体现(embodiment)^[1]的讨论既贯穿于一般性的理论研究,也渗透到专门性的子学科研究。事实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不只是非具身性的(disembodied)心智,不受身体感觉和习性影响,而是包括了会思考、有感情的身**体**,这种认识已经成为社会学想象力的核心要义。不过,纵然取得如许进展,在有关当代社会的绝大多数阐述中,要说到身体的地位、生成性能力,以及对结构性力量的接受能力,依然把握不到清晰的画面,令人沮丧。

本书正是针对这一背景,旨在从理论探讨上和实质研究上都能对身体研究有所贡献,推而广之,对整体上的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研究有所助益,并且处理身体研究领域依然面临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将尝试完成以下任务:(1)说明具身体现在社会理论中为何如谜般难以捉摸;(2)试论古典社会学著述有一点会通之处迄今未受重视,就是把身体看成社会之构成过程中的多维中介;(3)点评晚近有关该主题的各种思路;(4)对身体与经济、文化、社交和技术等之间的关系展开一系列实质分析。这四大目标彼此关联,因为这种古典会通,也

[1] 原文为“embodiment”,此词在身体研究中可谓最常见也最难译,可指身体的具备、特征、状态、过程,以及在经验研究和理论阐述中身体视角的凸显。可视为汉语中“具体”与“体现”两者的综合,但这两个词在日常语言中另有意涵。单纯译作“具身性”或“涉身性”(国内心理学界多见此译)甚至“身体体现”(译者本人曾经使用)也不是很理想。

就是我所概括的肉身实在论 (corporeal realism), 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框架, 可以使身体在分析时不那么难以把握, 并克服晚近各思路在理论上的某些局限。它还使我们能够考察晚近这些思路的一大特点, 即强烈关注对具身性主体的扼制。本章作为全书开篇, 就是要比较详细地探讨身体在社会理论中为何难以捉摸, 然后勾勒本研究所要采取的框架, 并为读者初步介绍贯穿其下各章的各大主题。

一 难以捉摸的身体的兴起

<2> 纵观现代思想, 身体无处不在, 但又难以把握, 为了说明这种性质, 本书的第一项目标就在于考察身体主题在学术界如何开始赢得异乎寻常的普遍关注, 但当我们探问“何为身体?”时, 却依然身影朦胧。说其蔚为流行, 是指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以来, 对身体这一主题的关注呈现出惊人的爆炸式增长态势。不过, 最初激起有关学术兴趣的却是某些社会趋势和分析, 在它们的推动下, 身体被定位成对**其他**一大批公认具有重大思想意涵的主题而言意义重大。有几股社会思潮和分析视角为身体最初的兴起推波助澜, 有必要择其要者重新探访, 再作考察, 因为它们有助于解释, 具身体现这一主题为何既无处不在, 又始终聚讼不已, 难以把握。关注身体的态势之兴起也体现出社会学领域晚近的发展到了一个离心阶段, 因为它使得该主题的研究议程纷繁各异。不过晚近另有一股更具向心性质的趋势与之针锋相对 (适逢几股宽泛视角逐渐凸显, 成为考察具身体现的主导资源), 我将在本篇概论稍后讨论。只是前一种趋势尚未全面退散, 依然影响着该领域的发展。

首先, 分析消费文化的论家们强调指出, 在人们的自我认同观念中, 商品化的身体越来越居于核心位置。与这种趋势分不开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在 20 世纪下半叶出现的相应转变。在这段时间里, 关注的焦点从生产领域里的辛苦工作, 伴之以消费领域里的勤俭节约, 转向鼓励辛苦工作与享乐主义消费的精神氛围 (Featherstone, 1982)。身体在广告文化中成为无处不在的符号, 以休闲为导向的生产兴旺发达, 更进一步助长这个社会强调实现某种外表, 实现某种程度的身体控制, 能够配合一味讲求效能的“展演/绩效自我” (hyper-

efficient 'performing self')^[2] 的展示。

讨论消费文化的理论家在分析这些发展趋势时,借助了滕尼斯的共同体/社会体(Gemeinschaft/Gesellschaft)之分和涂尔干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之分所提供的相关概念棱镜。比如说,帕西·法尔克提出(Pasi Falk, 1994: pp.12-13, p.36),晚期现代自我的边界已经逐渐脱离了集体性的身体仪式的纽带,转而围绕着个体化的消费行为,侧重于“身体表面及其感官开口”。这种发展趋势显然与消费主义的影响日盛息息相关。一方面是前现代时期受集体性决定的身体,另一方面是晚期现代的个体化身体,这种分别也支撑着吉登斯(Giddens, 1991)和特纳(Turner, 1984)的研究。他们两位的分析方式相差甚远,但都聚焦于消费文化发展的社会政治背景。他们提出,身体越来越作为消费的唯一载体而“公开展示”,而社会地位也与身体自我的可见外部相维系。不妨认为,人们越来越以表面形态的思路来看作为外表的肉身,也就清空了身体在基督教传统理念下的意涵,即作为原罪的容器,转而倡导其成为一种身体资本的形式(Bourdieu, 1978)。

对身体的关注日趋兴盛但也纷繁各异,在背后有所助力的第二种视角就是所谓“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兴起。自20世纪60年代以降,女性主义就对生物性的生理性别(sex)与文化性的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概念区分提出了批判,强调在女性的肉身特性当中,并不存在任何天生如此的东西,能够为其公共臣属的地位提供正当化理据(Oakley, 1972)。她们提出,像经期和怀孕这样的现象,并没有给出任何合理的依据,可以在教育或政治中歧视女性。因此,女性主义研究揭示的身体就是一种生物学角度上生理性别化的身体,不应当产生什么社会后果,但在男权制^[3]社会中,却被规定为女性生活机会的决定因素。

<3>

女性主义著述还凸显出身体是如何被用作针对女性的歧视的一种手段。不过,由于有关该主题的撰述历史以“男流”为主导^[4],所以女性主义者起初并不力求将身体置于社会思想的核心。哲学家们传统上把男性与自由和心智

[2] “perform”及其衍生形态“performing”、“performance”、“performativity”,有“表演/展演”、“执行/履行”、“成就/绩效”等虽有差异但有微妙关联的意涵,我们将在文中视具体语境灵活选择或组合各种译法。

[3] “patriarchal”,我们将在文中视具体语境,灵活选择或兼采“男权制”、“父权制”的译法。

[4] “male-stream”,与“manstream”类似,都是在“mainstream”(主流)一词的基础上转化而来,意指男性主导(但被自然化、中立化)的历史写作。

联系在一起，将女性跟“与身体相维系的非理性”联系在一起 (Grosz, 1994: p.4)。女性被视为“比男性更具生物性，更具肉身性，更具自然性”，因此也更适于私人世界而非公共生活 (同上引)。当然，尽管女性主义对具身体现的看法暧昧两可，但身体研究之所以能蔚然成风，它的确贡献良多。爱森斯坦 (Eisenstein, 1988) 与威廉斯 (W. Williams, 1997) 回溯了将女性身体视同男性财产的法制史；麦金农 (Mackinnon, 1989) 则强调了通过建构“强制性异性恋”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实现对女性的压迫所具备的身体基础；伊莉嘉瑞 (Irigaray, 1988[1977]) 和克里斯蒂娃 (Kristeva, 1986) 则考察了男性文化中对女性的性 (sexuality) 的边缘化或“消抹”。女性主义者还将“重新探索和考察有关女性肉身特性的观念” (Grosz, 1994: p.14) 这一规划纳入研究议程，从性、伦理和立场 (standpoint) 认识论等方面来探讨身体 (例参 Haraway, 1994 [1985])，并建构出富有想象力的形上概念，将女性身体视为“流体”。不过，女性主义者凸显的还是在生理性别角度上见出差异的身体，所谓具身体现为人提供某些共同能力也带来某些共同弱点的观念，在她们的讨论中往往隐而不彰。

提升身体地位的第三类关注在于越来越意识到治理术 (governmentality) 类型上的变化，这些变化凸显出人的身体特性成为多种控制形式的作用对象。福柯的有关分析在这里发挥了关键作用 (Foucault, 1970, 1979a, 1979b)。他考察了现代性对“人”的创造是如何伴随着治理话语的对象的转换 (思虑重重的身体取代血肉鲜活的身体成为关注焦点)；话语目标的转换 (从执迷于生死予夺转向关注安排生活秩序)；以及话语范围的转换 (从控制无名的个体转向管理分化的人口)。比如说，18 世纪经历了性话语的大规模增长，将个体身体的性与对国民人口的管理联系在一起 (Foucault, 1981)。20 世纪的特点则是进一步的转换，从各种否定性的压制身体转到肯定性的劝导身体，鼓励具身性主体以特定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

<4> 如此聚焦于治理术，所刻画出的身体形象就是比较消极顺从，缺乏分化，受制于制度 / 机构控制。它注重研究容纳 / 扼制 (contained) 身体的空间，拘束身体的规则，以身体为运作场所和渠道的力量。比如说，教学医院大大推动了医疗规范的发展，并将各具特色的病体类型分划到不同的处置类型 (Armstrong, 1983, 1995)。这种对身体特性的特别关注也将聚光灯投射到政

府在当代处置数量庞大的身体时面临的一些问题。今天的全球各国政府要管理的人数，相较千年之前，多出何止千百万。西方世界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与预期寿命的上升，医疗的进展，以及艾滋病之类要求长期治疗的疾病的兴起，都大大增加了与控制身体相关的成本。简言之，与治理术有关的议题固然有助于激起学术界对身体的关注，但它们所复活的那个身体却又被客体化为统计数字、棘手问题或是控制目标。身体如果触及政府的运作，就会蕴含意义；但若是在权力节点与网络之外的生活中维持、体验和干预身体，身体就会变得身影朦胧。

凸显本主题 / 主体轮廓 (raised the profile of this subject) 的第四项分析关注，就是那些使身体的“实在性”变得越来越不确定的技术进展。器官移植、试管婴儿、基因工程等方面的进展都加强了对身体的控制，但也削弱了身体与机器之间的界限，促使某些人将人类重新概括为半机械人 (cyborgs)。同样，这些发展似乎还彻底质疑了我们关于具身性主体是什么的知识。启蒙运动思潮接受的那种个体性原则有赖于确定，刨去所处时间地点的或然性，一个人的独特之处何在，然而身体的潜在可塑性则会威胁到这类恒常性质。比如说，人类基因组计划揭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从理论上讲，具身体现的一切方面都可以改变，而（在撰写本书之时）外科手术已经接近于能够实施脸部移植（这样的手术会进一步动摇所谓持续可见的自我的观念）。在这样的情形下，看到后现代主义者的著述放弃现代主义式的“认识”何为身体的规划，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他们眼中，身体成了一块“白板”，或是一套“信号接收系统”，始终等待着被超出其控制的社会力量（重新）建构 (Kroker and Kroker, 1988)。在德勒兹和瓜达里的研究中，身体已经转形为难以把握的“没有器官的身体” (Goodchild, 1996)。表面看来，主体的“去中心化”过程已经走到了极致。

即使说这些技术进展促使分析家们聚焦于“不确定的身体”，也并不总是就会导致对“半机械人”或“渐趋消散的身体”之类的后现代关注。有些论家不满于消抹具身性主体的确凿性，在分析这些技术进展的时候，也会注重其审美上、感官上的后果。比如说，有论家指出，虽然我们关于身体的知识失去稳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身体本身“趋于消解”，而是意味着丧失心理上的“基本信任”或“本体性安全感” (Berger, 1990 [1967], Giddens, 1991: pp.45—47)。另有一种说法，把身体据说的不稳定性与现代世界中凡俗的东西业已

陈腐乏味、对神圣东西的欢腾体验趋于复兴联系到一起 (Mellor and Shilling, 1997)。这些论著把“不确定的身体”置于上述社会特征和肉身特征中, 就使后现代著述的相对主义主张本身也相对化了。身体固然已经变得更具可塑性, 但遭到瓦解的并非身体的身体特性本身, 而是我们对身体的感觉。

分析上的第五项主要关注依然是, 一方面使该主题愈益流行, 同时也把对身体的研究兴趣增长维系于其他智识议程。与这项关注相关的学人们把该主题看成某种概念资源, 有助于推进各自的学科。就社会学而言, 理论家们运用身体来摆脱帕森斯因为侧重于价值 (把身体描绘成只是行动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而导致的过度社会化的个体观 (Parsons, 1991[1951]: pp.541—542, pp.547—548), 避免理性选择理论不切实际的预设 (该理论主张, 行动者在展开行动之前, 就已经从认知上确立了目标, 并认为身体是始终可以利用的行动工具, 不受固有弱点、偶然机会和所谓顿悟的影响)。例如, “创造性” (‘creativity’, Joas, 1996)、“人的存在” (‘human being’, Archer, 1995) 和“具身性互动秩序” (‘embodied’ interaction order, Shilling, 1999) 等概念都致力于给出一些特别的具身体现观念, 能够避免陷入任何单维的社会行动观或结构决定论社会分析。在这些实例中, 身体都构成社会实在要素, 却遭到忽视, 其容纳能力对学科分析具有重要意涵。

这五路社会思想或分析关注大大刺激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身体的研究兴趣的兴起, 并非常有助于这种兴趣的延续。但它们对这一主题的切入角度和界定方式却相当不同。在研究消费文化的理论家眼里, 身体就是一种表面现象, 已经成为颇具可塑性的商业价值标志, 受制于变幻不定的时尚。在女性主义者眼里, 身体就是一种性别化的客体, 被用作证明女性臣属地位之正当性的手段。在秉持福柯路数分析治理术的学者眼里, 身体是一种被变动不居的控制模式弄得消极顺从的客体。如果关注的是随着“半机械人”的发展, 肉体与机器趋于汇合, 那么身体就变成了前技术时代文化的残余, 前途难卜, 甚至正在迅速消散。最后, 如果各路论家只是一门心思在各自学科内部探讨理论问题, 身体就成了一种正面肯定的概念范畴。在这些分析内部, 聚光灯都只是停留在身体的某些特定方面, 其他方面的身影则晦暗不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有关该主题的研究汗牛充栋, 这些各成一路的关注

也都有所反映。^[5]世人公认,单凭这类研究的数量庞大,即可证明一块新兴研究领域正在以健康态势确立。有关身体的著述挑战了传统预设,即“社会以思想和共识的方式作用于我们,而非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身体”(O'Neill, 1985: p.48)。它们已经确立起几块新的子学科研究领域,并对社会文化理论作出了整体上的贡献。不过,“身体”依然是社会科学中最具争议的概念之一,有关身体的分析成了某种思想战场,从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现象学、女性主义、社会生物学、社会学到文化研究,各自的主张在这片战场上打得不亦乐乎(例参 Howson and Inglis, 2001)。身体被捆绑上彼此竞争的研究议程,针对纷繁多样的身体研究的背景,分别凸显具身体现的多种侧面,其他侧面则任其淡出。其结果,身体退出眼界,偏出视线,经历一系列变形,各种化身(incarnation)之间彼此难以辨识。当然,在社会学中,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体研究,注意力总会不时落在结构和规范上,注重这些现象的约束潜力和形塑潜力。就此而言,

<6>

[5] 有些文献致力于构建一块身体研究领域(例参 Turner, 1984; Frank, 1991; Synnott, 1993; Shilling, 1993)。除此之外,出版的著述有的强调文化与生物特性之间相互作用的社会后果与医学后果(例参 Hirst and Woolley, 1982; Freund, 1982; Turner, 1991a; Wilkinson, 1996, 2000; Elstad, 1998; Newton, 2003a, 2003b; Williams et al., 2003; Williams, 2003a, 2003b);有的凸显具身体现的结构维度、沟通维度、政治维度和解释维度(例参 Johnson, 1983; O'Neill, 1985);有的侧重对当代各种形式的具身体现进行谱系学考察(Feher et al., 1989; Laqueur, 1990; Sennett, 1994; Sawday, 1995; Hillman and Mazzio, 1997; Mellor and Shilling, 1997)。此外,女性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作品考察了具身体现的男性模式与女性模式之间的权力关系,理论家们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身体伦理(例参 Butler, 1990, 1993; Diprose, 1994; Grosz, 1994; Frank, 1995; Kirby, 1997; Shildrick, 2002)。还有学者研究各种感觉,研究情感的具身性(例参 Scarry, 1985; Howes, 1991; Classen, 1993; Bendelow and Williams, 1998; Burkitt, 1999; Craib, 1997; Shilling, 2002);更质疑西方传统的心身关系论(Burkitt, 1991, 1999, 2002; Crossley, 2001)。下述相关领域的研究作品也是层出不穷,如关于老年化、男性特质、女性特质与身体之间的关系(Davis, 1995; Featherstone and Wernick, 1995; Connell, 1995; Peterson, 1997; Watson, 2000);关于健康、疾病、残障、生殖遗传与身体的关系(例参 Turner, 1995; Freund and McGuire, 1991; Peterson and Bunton, 2001; Seymour, 1998; Ettorre, 2002);以及身体主体的“生命体验”(Young, 1980, 1998; Crossley, 1995, 2001; Wacquant, 1995; Nettleton and Watson, 1998; Ahmed and Stacey, 2001)。还有一些作品考察了对身体的医疗管理(Martin, 1987, 1994),具身体现的文化地理分布(例参 Rodaway, 1994; Ainley, 2001; Bale and Philo, 1998; Nast and Pile, 1998),共同体与宗教的身体基础(例参 Bynum, 1987; Brown, 1988; Mellor and Shilling, 1994; Coakley, 1997),后殖民身体(Ahmed, 2000; Holliday and Hassard, 2001),以及哲学的具身体现(例参 Burkitt, 1999; Lakoff and Johnson, 1999)。关于生物技术给自我认同造成的后果,研究兴趣也是迅速增长(例参 Haraway, 1994 [1985]; Heim, 1992; Kimbrell, 1993; Featherstone and Burrows, 1995)。——原注 [21—22]

我们应当预见到，在这类分析的有限部分，身体会出现有正当理据的暂时“退隐”。但这和身体及其生成性能力完全消失大不一样，而我们在许许多多有关该主题的研究中看到的正是后面这种状况。概而言之，在许多论家那里，身体似乎成了一种单纯的隐喻，经此再去分别追求特定的关怀。在这种状况下，越来越难界定身体，就连该领域中究竟在考察什么东西也越来越难说清。就以该主题中最知名的两项研究为例。布赖恩·特纳的结论是，身体或许显得固定确凿，但却是“最难把握、最充满虚幻……最具隐喻色彩……始终遥不可及的东西”（Turner, 1984: p.8）。而朱迪斯·巴特勒则承认，原本“试图考察身体的物质特性”，结果却“总是把握不住主题”（Butler, 1993: p.ix）。

二 缺乏限定的身体

如果我们打算说明，身体为何会出现这种既无处不在又难以把握的局面，就需要理解为何会有纷繁多样的智识规划激发出研究身体的兴趣，而对于这个主题，又是如何可能出现五花八门的界定方式的。这主要是因为，身体在西方思想中从不曾属于一股从正面利用概念的强大传统。从历史上看，哲学一向赋予身体一大堆负面内涵，这就使当代的论家们有了相当大的运作空间，赋予身体在理论上富有收益的正面意义。

在西方思想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关于物质肉身的负面观点，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soma”即指躯体（corpse）（随后开始指“身体”[body]）。苏格拉底提出，能够持久的幸福并不来自（会腐烂的）身体，而得经由（不朽的）灵魂。这种区分后来发展成对应的“非理性激情”与“理性思维”之间的区分（Snell, 1960 [1948]）。概而言之，希腊伦理学主张，灵魂的欲求应当以某种称为“健康思考”的自我控制为引导，与之相对立的则是身体本能与情感等不可避免的“苦难”。这种哲学思路通过主张是心智让我们成其为真正的人，将身体的重要性放逐边缘。对身体的这种贬损尽管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例外，但伴随现代世界而来的一些重大事件却进一步巩固了对该主题的负面观点。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在这方面扮演的角色尤其重要。

16世纪新教改革运动后的宗教战争创造了一种新局面，现代哲学的主要倡导者面临政治上的不宽容、作为竞争对手的神学家的教条主张，以及常常把

身体与非理性和原罪维系在一起的身体观。在这种情形下，就有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开始将“探求确定性”作为确立真理的道路，而真理无处不在、普遍适用、永恒常在，独立于人们变幻不定的身体倾向和情感（Toulmin, 1990）。这种“探求”乃是基于心智无所偏倚的理性之力，其典范代表就是笛卡尔。笛卡尔主张，我们的人性之本质就在于我们（高贵的）思考能力，而我们的身体则用（卑贱的）情感来折磨我们（Toulmin, 1990: pp.134—135）。他为了表示对感觉的不信任，主张“我思故我在”，“我的心智……完全地、真正地有别于我的身体，没有身体也能存在”（Descartes, 1974: p.105, p.156）。霍布斯反对笛卡尔的许多相关阐述，倡导一种彻底不同的哲学，以身体为基础，以秩序问题为核心（即怎样才能使人们共同生活而社会生活不退化为暴力）。不过，即便在这里，身体也只是被领会成一种累赘（liability），迫使人们进入自我扩张的行动，由此导致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并没有怎么改善这些负面的身体观。启蒙运动在思想上固然是异彩纷呈，但其主导思想倾向却是把个体看成其行动的理性的、认知性的作者（Cassirer, 1951; Hamilton, 1992）。比如说，伊曼纽尔·康德，启蒙运动中让人想到的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就否认身体与欲望有作为行动动机的价值，否认评判善恶的标准有可能根植于人的自然属性（Kant, 1964 [1785]）。相反，康德提出，人是理性的存在，个体只有超越自然，遵从绝对律令，才能达致“善”（Kant, 1985 [1797]: p.56）。

前文我已指出，对身体的这种贬损倾向也有一些例外。不仅是霍布斯，还有德·迈斯特、费尔巴哈、尼采、胡塞尔等人，以及与社会学相关的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人，都被认为是身体相关著述“被掩盖的历史”的重要论家（Turner, 1991a; Shilling, 1993）。不过，随着 20 世纪的演进，这股历史被两大潮流所主导，它们都与该主题相关，只是未能最终统合理论上富于收益的各种人类具身体现观念。

一方面，认为身体在创造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扮演正面角色的思想家尽管越

<8>

手段”(Merleau-Ponty, 1962)。而欧文·戈夫曼则关注“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shared vocabularies of body idiom), 强调指出, 在缔造社会自我、维持社会互动的过程中, 身体的外表与对身体的管理都十分重要(Goffman, 1963)。然而, 这类论著各自为战, 断续零落, 意味着身体在概念上的正面意涵依然缺乏限定(under-determined)。

另一方面, 帕森斯的作品更加巩固了身体在社会学中这种缺乏限定的处境。帕森斯是 20 世纪社会学中最具影响的论家, 但他的学科观却在整体上压制了身体在此前理论家的作品中曾经有过的重要意涵, 将之放逐边缘。他所构建的学科观把霍布斯对秩序问题的“功利主义”解决方案当做负面参照, 从而导致了这种局面。帕森斯拒绝接受霍布斯有关社会行动的动机何在的分析, 并提出自己对秩序问题的替代解决方案, 即强调规范(Parsons, 1968 [1937])。更要命的是, 他还提出, 现在有了一种统合一体的社会学传统, 业已用更加切合实际的共同价值整合的关注, 取代了霍布斯对身体激情的关注。例如, 可以重新解读涂尔干关于身体的集体欢腾的著述, 视之为是在分析共享价值和规范整合。帕森斯这一招势不可挡, 一笔勾除了身体对古典社会学的重要意涵。

但就我们的考察宗旨而言, 这一背景中的要害在于, 如果此前已经有一股强大的理论传统从正面使用这一概念, 使其被过度限定(over-determined), 那么当代理论家再要想赋予“身体”纷繁多样的生产性能力, 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已经看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对该主题的研究兴趣蔚为兴盛, 但不同的智识规划界定身体的方式却是彼此对立, 赋予身体的角色也是相互排斥。身体被多方勾连, 或被视作任由文化效应“书写”其上的“白板”, 或被当成多种特性/身份/认同^[6]的建构因素, 或被看成不可化约的差异的标志, 或被认作多种治理微观权力的接受体, 或被视为克服心/身、文化/自然之类标志着传统社会思想的“二元对立”的载体, 乃至一切体验的生理场所。世人不久便明白, 身体一事, 可谓见仁见智, 任由众家分说。无论如何, 身体作为符号极具可塑性这一点固然有助于它在学术思想中大受欢迎, 但也加剧了它难以把握的性质。身体究竟是什么, 到底应当如何研究身体, 似乎毫无共识可言。

[6] “identity”这个词可能强调“自然”生理属性, 或“社会”建构过程及结果, 或“个体”建构过程及被建构后的结果, 因此全书将作灵活选择或加以组合。

三 古典基础

<9>

身体在概念上这种缺乏限定的状况，显然对理解该主题为何在当代社会思想中无处不在却又难以把握甚为关键。不过，如果我们希望在身体研究领域中取得理论上的进展，就必须对身体的能力达成稳定的理解，而解除帕森斯对身体的压制可谓对此大有助益。有鉴于此，本书的第二项目标就是恢复身体之于社会学的核心地位。这并不是要单纯评述与身体相关的社会学著述。我并打算在此浮泛概括古典理论家有关身体的全部阐述。这项任务此前已经做过，但并没有真正捕捉到身体是如何支撑起社会学传统中的众多核心概念与作品。相反，我力图强调，在分析身体的手法上，几位古典名家自有其会通之处，只是此前为人所忽视。

帕森斯是社会学中会通命题最著名的倡导者 (Parsons, 1968 [1937])。他的考察重点在于社会行动，认为在看似互无关联的一些社会学著述中存在某种共同的基础，即非功利主义的“意愿行动论”。帕森斯的作品往后不断遭人抨击，指其解释含混不清，基本算不上身体研究的有用资源，当然这也有些失之公允。不管怎么说，当代对具身体现的研究兴趣忽视了一种可能性：某些古典论家或许的确有所会通，但却并非如帕森斯所言，在于如何处理行动问题，而是在于如何从概念上梳理身体，既视之为社会的生产因素，又视之为社会权力的接受因素。^[7]在马克思、涂尔干与齐美尔的学说之间，可以说就存在这种会通。我在介绍他们的作品时会集中探讨这种会通，以便建构本书要用的理论框架。这还不单是因为他们有关身体的论述彼此互补，令人惊喜，而且还因为他们都为我们提供了满怀伦理考虑的标准（分别关注剥削与压迫，个体力量通过集体层面获得增进，理性化效应与个体人格发展^[8]），可以据此评估身体在当代所处的位置。

[7] 莱文有一篇文章讨论古典社会学家的作品中晚近被捕捉到的会通之处 (Levine, 2000)，尽管并非专门处理身体问题，但也能体现出，如能精确把握看似难以相互通约的作品之间的呼应与共识，当能获益良多。——原注 [22]

[8] 要说讨论理性化的理论家的不二人选，韦伯自是齐美尔的强劲对手。不过，实实在在地讲，齐美尔有关货币经济的分析 (Simmel, 1990 [1907]) 讨论理性化对现代人的性格的效应，可谓非同凡响（参看 Turner, 1986）。不仅如此，韦伯往往会贬损发乎于情和习惯成自然的行动，而齐美尔则更加注重身体内涵与驱力所产生的具备社会生产性的效应。——原注 [22]

不过，马克思、涂尔干与齐美尔之间也隔着巨大的差异。依流俗之见，他们的著述在理论上彼此难以契合（比较显著的原因是他们各自源于彼此对立的哲学传统）。但我想指出，这种评价需要有所调整，因为他们自有其会通之处，他们都认为身体及具身体验是**社会之构成过程中的多维中介**。因此，涂尔干的特点固然是一开始就赋予集合体以理论上和道德上的首要性，这里的集合体是一种由文化角度建构而成的自成一体的实在；他还考察了是否可能兴起一种道德个体主义，能为发达资本主义提供合适框架（Durkheim, 1984 [1893]）；但他也把身体看成某种集体象征体系的源泉兼接收方，该体系有能力将个体融入群体的道德生活。与此类似，齐美尔的特点固然是将理论上和道德上的首要性赋予（彼此互动的）个体，但他在分析中也把身体确定为某些特定倾向的源泉，这些倾向有利于形成此时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某些社会形式，后者会在个体身上激发出具有社会束结力的情感（Simmel, 1971 [1908a]）。齐美尔还阐述了这些形式如何在货币经济中凝结在一起，形成扼制生存的结构，促使人们玩世不恭，故作深沉，怠惰腻烦（blasé）（Simmel, 1990[1907]）。但他又主张，人的生命的身體活力依然葆有潜力，能超越现存的形式（Simmel, 1971 [1918b]）。最后，马克思将来自不同理论传统的成分融合在一起，聚焦于社会阶级、竞争性个体主义的市场、集体解放的可能性三者之间的关系。但他也把身体看成经济关系的源泉，并深切关注资本主义给身体造成的破坏效应（Marx, 1975 [1844]；1968 [1848]）。这些效应会使工人“适合于”市场上限制性的工作岗位，但也形成了阶级斗争和社会变迁的基础。

如果我们分离出这些分析的共性，以便更加看清其会通之处，就能捕捉到它们在身体观上三点相似之处。其一，马克思、涂尔干和齐美尔都认为，身体拥有一些属性，是创造社会生活的**源泉**。后结构主义将具身性主体视为“文化虚设”（a cultural artifact, Harré, 1983: p.20），与此相反，如此承认身体作为社会之源泉，等于主张我们的身体存在是一种积极主动的生成性现象，并不完全由社会的属性所给定。广而言之，我们基于身体乃社会之源泉的观点可以推出，具身性主体拥有某种意向性能力，能够影响日常生活流；它还拥有一些具备社会创造性的能力，这些能力源于身体的感觉性和运动性，并不总能被个体直接意识到。视身体为社会之源泉的观念也意味着，从人的基本能力到社会结构，存在某种因果关联，其运作有时无关乎主体的自觉意向和思维。